



# 权力话语与故家叙述

## ——明代台阁文人族谱序的文体新变与功能转型

李 晗

**内容提要** 明初洪武、建文时期，族谱序书写零散，不成规模。永乐以降，族谱序数量骤增，台阁文人族谱序繁兴，其文体内涵、形态、体制等诸多层面异于明初，呈现出大为不同的话语逻辑与言说方式，为族谱序书写注入了新质。台阁文人通过变造世系等手法重构谱系，完成了符合儒家礼教的文化建构，使族谱序向功利化书写的新面向转变。台阁文人对故家传统与诗书嗣连的强调，使族谱序化身为江西籍台阁文人集体的强势话语系统，强化其社会利益格局中书写权力与话语的争夺，推动其在地域性政治竞争中博取更多的文化资本。永乐至成化间台阁文人族谱序向独特的科举仕进意义、宗族建设意义、地缘政治意义的转换，昭示出独特的文体价值与文学景观。

**关键词** 台阁文人；族谱序；政治陈述；世系重构；权力话语

族谱是指在中国宗族中所构造的以谱系为中心的记录<sup>[1]</sup>，是记载家族历史的文献，又称谱牒、家谱、家乘等<sup>[2]</sup>。学界对族谱的研究比较兴盛<sup>[3]</sup>。族谱序是族谱的一部分<sup>[4]</sup>，是稍具规模的谱书卷首的一篇序文，用以说明一家一族修谱缘由，反映修谱家庭情形及与时代社会的关系<sup>[5]</sup>。族谱序是族谱开宗明义的部分，是极为重要的文献。但学界对族谱序的专门研究则显薄弱，拘限于关注其史料意义，如从考辨宗族迁徙缘由、族况及修谱情况、会通谱序与统宗谱序类别差异等视角抉发其价值<sup>[6]</sup>。学界对明代族谱序的关注更少，即便有一些探讨<sup>[7]</sup>，也少有从文体论角度考察。因为无论是古人，还是根据现代以来的“文学”定义开展研究的现代学者，均未将之作为一种文学类型看待。原因大致有三：其一，从原始状态看，明代族谱序被放在族谱一起印制，后人在编辑文集时才将之收入四部分类的“集部”，方与序跋一起形成一种独特的文类，才被后人视为与“文学”相关的品类，从而才有了公共传播的效应；其二，明代族谱

序属“书序”<sup>[8]</sup>亚类的“史部序”，相当于简明扼要的家族发展史，篇幅有限，行文简略，常以一种广义的方式探讨与族谱的关系，传达的信息较为抽象，研究者对“族谱序”与同属“书序”的“集部序”两种不同文体功能差异认识不足，对前者研究有所忽略；其三，明人集部序常作为文论思想的容载文体备受瞩目，集中体现明人诗文、戏曲、小说理论，与族谱序相比，同明代文学的重要概念、命题结合得更为密切，故研究多集中于此。综上，由于编纂形式、表现形态、文体内容等原因，明代族谱序的研究局面尚未完全打开。

明永乐后族谱序数量爆发式增长，文体异常发达，这一现象值得注意。明永乐至成化台阁文人族谱序的文体新变，与皇朝更替、政治变迁、历史事件、士人意识、理学思潮、宗族组织、地域差异、文体辨别等密不可分，是文学书写与明前期政治、历史、宗族、社会的一种特殊关联方式。以永乐为界，考察这一文学现象具有特殊的学术意义。本篇拟对明前期族谱序做初步统计分析，试从修谱热潮



的社会性因素、纂修族谱的文化层面、撰作族谱序的内在因由入手，通过“权力话语”和“文化资本”等理论概念的引入，捕捉渗透在族谱序话语中台阁作者所采取的言说方式、表达逻辑，以期能在台阁士人族谱序的文学生成、体制新变、功能转型等问题上有一点创见，并希望通过这些探讨，在明代台阁体研究<sup>[9]</sup>上有所推进。

### 一 修谱联宗与秩序重建： 族谱序繁盛的话语背景

从族谱序规模的整体情况看，可以发现一个颇为有趣却较难解释的文学现象：元末明初士人族谱序的书写仅宋濂一人比较突出，体现在谱序数量（14篇）及谱学理论方面，同时期撰作族谱序10篇及以上的明初士人仅3人——危素15篇、方孝孺11篇、刘崧10篇，再依次向下排列，王祎7篇，贝琼4篇，苏伯衡4篇，其余则为3篇及数量更少的撰作者，可见此期族谱序书写零散，尚未形成风气；永乐后，族谱序书写人数及数量陡然增多——杨士奇57篇、王直52篇、陈循28篇、梁潜22篇、胡广19篇、程敏政18篇、李东阳14篇、李时勉12篇、萧铤10篇，族谱序写作蔚然成风。这种文体现象提供给我们一个思考的切入点：永乐后族谱序文体体量规模变动是否与政治变动有所关联？具体体现在连贯性与承续性，还是分流性与断裂性？此类变异产生的原因是什么？这个转折性节点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些学界极少涉及的问题，却是初步探入台阁文人族谱序研究的关键。

元末战争阻碍了传统家族的传承，许多世家大族遭到打击和毁灭性破坏，百姓迁徙不定，亲人流离失所，祠堂化为灰烬，宗族谱牒失坠，“更元季数十年，兵戈寇勦之祸，糜坏之极，凡名家巨宗倾圮消灭，皆不能存什一于千百……虽乡之遗老时能道其先德于人，然文字之所纪者无传焉”<sup>[10]</sup>，“族无所统，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味疏戚之谊，失昭穆之序，至有老死不识”<sup>[11]</sup>。谱牒散失、被毁，与之相关的文化记忆随之湮灭，造成了文化传统的断裂。历经社会动荡、干戈扰攘的易代之际，明承元祚，洪武、建文时期，国朝初定，但国家仍

处乱平过渡期。仅洪武时移民就有百余次，民籍移民达到765万，民籍和军籍移民达1100万人，人口迁移的绝对数量和相对规模不仅在明以前移民史上绝无仅有，在明代移民史中也是强度最大的<sup>[12]</sup>，这使家族四分五裂，族谱破坏严重、传承中断。

饱受残酷战争摧残及大规模移民后，人们的怀祖感和继续感比以往更为强烈，各家族不约而同购祖田、修宗庙、寻宗亲、制谱牒，开展大规模继宗活动，表达对传统的追怀以服务情感认同的需要。靖难之役后永乐帝迁都北京，面对种种破败景象，首先面临的问题便是恢复人口和生产，复兴家族。永乐后的台阁文臣将编纂族谱作为士大夫复兴宗族的一项重要工作，以官方身份倡导全国性的谱牒纂修。但族谱续修与重修是一项浩大而费力的工程，尤其在战乱之后，修谱工作更显繁难。尽管如此，明代前期的族谱还是达到了中国谱牒史上的一个高峰，可见这次宗族复建活动的盛大与成效。

台阁文臣还撰文倡导发展宗族事业，如杨士奇、王直对宗族复作祠堂、修建家祠的重建行为大力提倡，称赞有加<sup>[13]</sup>。台阁文臣还为谱牒书写了大量的族谱序跋，超过元人撰写族谱序跋的总量<sup>[14]</sup>，仅杨士奇一人的族谱序跋就有72篇之多。因此，修谱、制谱热潮与永乐至成化间台阁文臣族谱序书写的兴盛互为语境。明确这一点，有益于我们在观察此期族谱序时有更为贴近的话语背景。

### 二 乱治对比与政治修辞： 族谱序文体属性的新变

永乐后全国性大规模的宗族重建活动，尤其是声势浩大的谱牒纂修，为族谱序的新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前置性背景。永乐以降台阁儒臣的族谱序呈现出与宋濂、方孝孺为代表的洪武、建文朝士人族谱序大为不同的文体新质，这些构建着台阁文人族谱序话语逻辑与言说方式上的文体新变。

#### （一）政治境域中的话语形态

永乐以降台阁成员族谱序在书写内容、宗族理念阐释方面与明初诸人确有一定承继之处。明初文人宗族思想集中体现在宋濂《方氏族谱序》《桂氏家乘序》《俞氏宗谱序》<sup>[15]</sup>、方孝孺《宋氏族谱



序》《葛氏族谱序》《楼氏宗谱序》<sup>[16]</sup>中。具体而言，承继之处体现在族谱功用的论述上。其一，敦亲睦族。这是洪武、建文时文人在族谱序中阐释最多的观点，如方孝孺《葛氏族谱序》<sup>[17]</sup>。台阁文人也有类似叙述，如《甄氏家谱序》<sup>[18]</sup>《宋氏族谱序》<sup>[19]</sup>《古林黄氏续谱序》<sup>[20]</sup>《林氏族谱序》<sup>[21]</sup>，展现了敬宗收族的指导思想及族谱基本功能，即明确亲疏关系，增强凝聚力，达到睦族目的。其二，教化乡人。宋濂曰：“况夫道德之士仁声义闻足以厉俗而化人者，何患其无传乎？”<sup>[22]</sup>台阁重臣对此深信不疑，如《菊城颜氏宗谱序》<sup>[23]</sup>《湖西罗氏族谱序》<sup>[24]</sup>《梅氏族谱序》<sup>[25]</sup>《清溪陈氏谱序》<sup>[26]</sup>《浮梁田西李氏增修族谱序》<sup>[27]</sup>《环水王氏重修族谱序》<sup>[28]</sup>指出族谱可以激发对祖先的孝悌慈良之心，使人敬重祖先，发扬孝道，唤起乡人善性，启发仁厚之心。从族谱序生成机制上看，台阁文臣积极组织族谱编纂，通过撰作族谱序对宗族成员教忠教孝，实施教化。

尽管明初文人与台阁文人对族谱的一般功能与目的已有共识，即“化族”之俗、“化乡”之俗，但还有一些宗族思想、族谱功用等为永乐后台阁士人所后发，族谱序在文本内涵层面发生了新变，即台阁文人族谱序所传递出的兼善天下、重建儒家社会秩序的政治理想。他们将族谱序视为扩充仁爱之心、推及至社会其他方面的有效途径。杨士奇言“君子之仁于家同一心，同一道也。盖君子施仁于国、于天下，必自其家始，未有不能仁于家而能及国与天下者也”<sup>[29]</sup>“得乎命而达也，用儒之道于国家天下，而功之及人博也”<sup>[30]</sup>“然能仁于家，而后能仁于国、仁于天下；能孝其亲，而后能敬君；能悖于族，而后能惠民。”<sup>[31]</sup>“仁爱施于家，推而及于民，又推而广之，天下之治所由以兴，谱牒非有关于人心世道者欤”<sup>[32]</sup>。胡广言：“此庐陵之所以有光于天下，而杨氏又有光于庐陵也。此世谱之所以必作，名家之所以慎重者，其在于斯。”<sup>[33]</sup>陈循言：“使凡萧氏子性能循守其先世诗书之习、礼教之尚于无穷焉，则岂特为一乡一邑称首，而致天下以为美也有不难矣。”<sup>[34]</sup>李东阳言：“太史君又承其家学，以大施于天下，皆将自兹谱始。”<sup>[35]</sup>对台阁成员来说，族谱的影响除属基层建构外，还超越

了宗族范围，延伸进更广阔的社会秩序里。他们将编写族谱视为保证国家整体秩序的手段，视为有助于维持社会秩序、有益于善政的工具，深谋远虑在于安定社会。以儒家德化为本的政治思想作为实用目的，囿限于政治教化范围内，具有极强的功利性，这为族谱序书写注入了新的内涵。

值得注意的是，台阁文人常将修谱活动置于乱治对比的二元结构中阐释。他们有意识地选择元末家谱毁于兵燹、散轶不传作为书写对象。族谱序中充斥着大量这样的创伤记忆，如“其谱自兵革后散乱失次者，皆不敢弃”<sup>[36]</sup>“晋溪之前，旧谱以兵燹”<sup>[37]</sup>“家谱毁于兵燹”<sup>[38]</sup>，还有《侯官林氏族谱序》<sup>[39]</sup>《泰和罗氏族谱序》<sup>[40]</sup>《泰和梅山曾氏族谱序》<sup>[41]</sup>《文昌坊程氏族谱序》<sup>[42]</sup>《休宁东门邵氏族谱序》<sup>[43]</sup>《茶陵谭氏族谱序》<sup>[44]</sup>《乐平乔氏族谱序》<sup>[45]</sup>都记录着曾经残酷战争带来的集体性创伤，道出世事纷乱使谱牒散失和族谱破坏的无奈。永乐后，正值政权趋于稳定、国家处于全面恢复和上升期，到仁宗、宣宗时期，“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羨，闾阎乐业，岁不能灾。盖明兴至是历年六十，民气渐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sup>[46]</sup>“文武贤臣，相与协德，共图康济”<sup>[47]</sup>。在国统初开、乱象已平的盛世气象中，重修族谱等承平之事便被正式纳入有序的社会建构中，与之相应，台阁文臣族谱序也出现了“太平之世”“国家之运”的政治修辞。杨士奇“二公文学忠烈炳然于天下，后世君子论其人，盖国家之元气也。而同出于一乡一族，岂非盛哉”<sup>[48]</sup>“际国家景运之兴”<sup>[49]</sup>“蓝田之产必荐于庙堂，邓林之材必收于匠输，忠义之宗，有君子焉，宜其效用于圣明之朝也”<sup>[50]</sup>，梁潜“太平之际，贤者皆乘时而用，及其乱也，皆沮塞而困穷，此势之所必至，无足怪者。大明之盛，杨氏之后人又以其学兴”<sup>[51]</sup>等论述，正是此期繁荣景象的真实写照。台阁儒臣“颂圣德，歌太平”，发盛世之音，这是国泰民安景象中辅成太平之治的表彰，表达着明永乐后的盛世气象。在永乐后这一新的历史阶段，政治环境发生新变化，台阁文人族谱序也便出现强调易代频仍、谱牒被毁与当前国家平明升腾景象的描绘，这种乱治对比的二元化的阐释结构，开族谱序新貌。





## （二）话语逻辑与体类特征

根据角色分析可知，台阁文臣的地位决定其在朝廷机制中为意识形态的制定者与书写者。黄佐《翰林记》记载，台阁文臣承担了很多官方著史工作，主要有修日历宝训、修实录、修玉牒、修书、修史、订辑经传、校勘书史等。胡广受命纂修《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又奉旨将宋代理学家的重要著作类聚成编，编纂《性理大全》。马愉、曹鼐与杨士奇编定《文渊阁书目》。陈循主持编修历代《寰宇通志》。彭时、商辂、程敏政主持、参与修纂《续资治通鉴纲目》。彭时与李贤担任《大明一统志》总裁官。当然还有很多台阁文臣都参与过明代历朝《实录》编纂工作。此外，金幼孜《北征录》、杨荣《北征记》、李贤《天顺日录》、商辂《商文毅疏稿》等皆为台阁文士所著史部文献。从这种书写倾向可知，台阁文臣的身份决定了他们不只是文坛引领者，同时也重视记录历史、编纂史集。

台阁文人史部序分多种，如政书类和官职类序、地志序、族谱序等。族谱序与其他类史部序又有所不同。台阁作者常述族谱史料的价值。胡广言：“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史以载事，谱以系族。无史则国之政绩不见，无谱则家之世数不传。”<sup>[52]</sup>萧镃《徐氏族谱序》<sup>[53]</sup>亦有此论。可知族谱属史类，且属一种特殊的史料，其内容和范围与一般类史书有所不同，族谱的重要性如正史之于国家，此类观点在其族谱序中屡被提及。

族谱序处族谱文献之首，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台阁文人族谱序是以纪实为主的文体，多叙族谱文献要旨。按照族谱序主要内容与书写逻辑划分，大致呈现出三种基本类型。第一类为台阁族谱序最常见的类型，主要表现为叙述宗族的始祖、宗族迁徙、繁衍、发展情况；凸显宗族中有突出贡献、功勋卓著的人物，赞颂先贤典范的历史功绩与德行；阐发纂修族谱的意义、撰写族谱序的功能；告诫族人析派衍、分亲疏、辨昭穆、明长幼、重孝悌、敦族谊、尊先世之训言懿行，遵守族规家训，读书明礼，用心治学，修身养德，立身处世，“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光宗耀祖等。此类族谱序侧重族谱的伦理功能，用大量篇幅阐释家族伦理的道德意

涵，强调敦宗睦族的团体意识，说明族谱序与儒学之关系，将教化作用的表达“化身”为宗族的常识常理，意在参与基层宗族建构，借此表达重建人伦秩序与儒家社会秩序的政治理想与强烈愿望。此类族谱序呈现叙议结合的语体选择。另外，台阁文人很少从禁止角度撰写，如宗族偷盗、越礼犯分、好论是非等阴暗面和劣迹恶行的揭露被台阁文人一并舍弃，而采用正面手法予以规劝，鼓励族人进德修业，表达对族人的期望。这种表达方式充分体现台阁文人提倡宗族正面人物和事迹、为尊者讳、对不贤者隐匿不报的“隐恶扬善”的撰作态度。

其他两类为非典型台阁族谱序。第二类着重叙述重修或续修谱牒起因及重修运作过程，如陈循《阳城林氏重修族谱序》<sup>[54]</sup>就比较典型。还有杨士奇《西昌梁氏续谱序》《沙溪刘氏重修族谱序》、梁潜《欧阳助教重修族谱序》等均属此类。第三类则详述世系起源、宗族历史，略论族谱意义，以程敏政为代表，在宗族阐释上最为突出，在文献辨证考订基础上评谱论谱，以史法为谱法，力求达到史谱相通、建立严谨真实的族谱世系。《绩溪坊市程氏族谱序》云：“余见程氏各族之谱多，其间脱误讹舛，亦往往而是。”<sup>[55]</sup>《新安程氏统宗世谱序》<sup>[56]</sup>一千七百言，自西周程伯休父一直梳理到成化新安程氏，引史不厌其烦。《五城黄氏会通谱序》<sup>[57]</sup>一千四百言，细数历代光耀宗族者，对族谱伦理功用一笔带过。程敏政本人重视宗族建设<sup>[58]</sup>，亲自编纂多种族谱<sup>[59]</sup>，此类族谱序的文体形态与程氏本人编修族谱实践及谱学主张相关联。

永乐后政治生态发生显著新变，族谱序的体貌特质同样体现出体制新变。明初文人在族谱序叙史部分险怪雕刻、浮诞奇崛、汪洋恣肆、气势充沛<sup>[60]</sup>。方孝孺《宋氏世谱序》<sup>[61]</sup>《童氏族谱序》<sup>[62]</sup>善用问句强调宗族观；苏伯衡族谱序与其极为相似，常用设问、反问，气昌辞达；宋濂族谱序短句运用突出，豪宕雄奇，古朴奔放，讲究开合纵横，如《章氏家乘序》<sup>[63]</sup>；王祎族谱序风格近于宋濂，淳朴宏肆，雄浑高迈。总体而言，洪武、建文朝族谱序致力于为新朝服务的思想，表现为节奏紧凑、音调激越、扬厉矫激、气魄豪放的阳刚之美。永乐以降，政治变迁、制度日臻完备，让这一





文体获得新的生机与发展，将这一文体演进推向一个新阶段，开创了族谱序的新形态，呈现出新面貌。永乐后台阁文人族谱序转变为用语平易、语气平和、情感平淡、简质平实、雅顺平正，展现出优游闲定、意态从容的气息与温柔敦厚的格调。不过因行文长句过多、结构过于稳定而缺少变化，略显固定单一，因节奏过于舒缓而缺乏力度，略显柔弱板滞，整体呈现一种文辞雅贍、温厚舒畅的新风。

### 三 利益诉求与文化资本： 族谱序话语功能的转型

进一步深入族谱序文本内部，可以发现，若从权力话语角度解读，永乐后台阁文人族谱序向功利化书写的新面向转变，族谱序也便发挥出与洪武、建文朝不同的文体作用，其文体功能的转型与文体意义的转捩，呈现出独特的文体价值。

（一）移位组合与重造谱系：世系建构的功利面向

台阁文人族谱序中随处可见祖先系谱、确认世系的叙述，如胡广《湖田胡氏族谱序》<sup>[64]</sup>，谱牒散失、宗族遭遇重创，则“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sup>[65]</sup>，《邹氏族谱序》<sup>[66]</sup>中也有论述。客观上讲，族谱记录着家庭与整个家族繁衍生息的基本历程，是家族历史传承的真实载体。台阁文臣族谱序阐述通过修订族谱编排辈分的作用，追根溯源、确认世系。

族谱学研究者一般认为，始迁祖是所迁之地宗族的血缘始祖。当然也有族谱没有记载始迁祖，或始迁祖并非显赫人物，就以远年同姓为象征性始祖，这在台阁文人族谱序中颇为常见。如《林氏族谱序》<sup>[67]</sup>称林姓则祖比干之子泉；《齐氏家谱序》<sup>[68]</sup>称齐姓起源自姜姓，始为祖姜太公子牙；《泥田周氏族谱序》<sup>[69]</sup>《周氏族谱序》<sup>[70]</sup>《侯官林氏族谱序》<sup>[71]</sup>中称周姓祖周瑜。在信仰上认同祖先出自太公望、周瑜等所在支系的记载可以看成台阁文人族谱序中世系建构的一个缩影。如钱杭所说，当时代和战火使世系模糊不清，人们就依靠回忆、确认、澄清、补足等来重造这些资源，这可能使世系更加漏洞百出，但重要的不是这种真实性，

而在于它表现了宗族对自身“合历史性”的高度重视<sup>[72]</sup>。实际上时过境迁，世系绵长，加之人口繁衍及迁徙，宗族内部出现分支，欲建立清晰准确的谱系十分困难。此种情境下对宗族早期历史的建构行为就很有必要，这在台阁文人族谱序中有充分体现。

然而，即便是台阁文人给自己本族及同僚的族谱序，也并非真实记录生物意义上的世系起源与宗族繁衍的自然发展历程。通常表现为变同姓为同宗的转化模式。杨士奇《泰和杨氏族谱序》<sup>[73]</sup>认为泰和杨氏与吉水杨氏系出同源，他还与族人重修了泰和杨氏谱图，并于永乐七年（1409）撰写了《泰和杨氏重修族谱图序》<sup>[74]</sup>，再次强化“重造”的世系。杨士奇家乘序言：“杨氏宋盛时自吉水徙泰和，世以资雄邑中。”<sup>[75]</sup>梁潜既是杨士奇同官，又是其姻亲世家，他在《杨氏族谱序》中言：“左春坊谕德兼翰林侍讲杨君士奇，以其所修杨氏之谱属予序。予观之而叹曰：‘何其盛哉！’杨氏，吉水、泰和两邑者皆出南唐虞部侍郎谿。虞部始居吉安郡中，其子迁吉水。若忠襄公邦义、文节公万里，皆出虞部，而谱不复录者，谱杨氏之在泰和者也。”<sup>[76]</sup>解缙为杨士奇所作《泰和杨氏族谱序》言：“杨氏自太尉以来，大抵以忠孝文学相承，而近世卓然冠吾族者，忠襄公也。公之死节有传矣，而十三人之中，公父子及一孙一家而四人焉。忠襄公即邦义，而万里则文节公也。”<sup>[77]</sup>按此说，杨士奇家族与泰和县相邻的吉水杨氏家族联系在一起，使其家族与宋人杨邦义、杨万里等名人家族有共同祖先。台阁成员关于始祖的书写，目的在于用与历史名人共祖激励教化子孙后裔，希望以“忠襄公杨邦义”和“文节公杨万里”忠孝节义、才华横溢的形象进行教育，“以贻后来，庶几为贤子孙”<sup>[78]</sup>。就这样，京职江西籍士人在族谱序中用移花接木的手法，完成了泰和杨氏世系的重构，同时也完成了所谓“忠节杨氏”独特的宗族文化建构。

刘志伟指出，为把世系向前推衍，并附会名人世族，需要通过“考据订正”重新编造出把近世和远代世系连接起来的世系<sup>[79]</sup>。“‘集体记忆’固然是‘基于一个由众人构成的集体’，但进行回忆的却是个人。”<sup>[80]</sup>对于杨氏宗族而言，台阁文人为杨



士奇撰族谱序的核心内容就是与杨邦义、杨万里等宗族精英建构共同祖先。根据族谱中虚虚实实的家族叙述资料撰写谱序，成为“祖先何处来”的宗族世系的阐释体系，族谱序具有了某种意义上的神圣性。但当话语权力介入族谱序文本时，这套话语体系是排他选择后的结果，缺乏真实性，是经台阁文人改造组织、拼接重造的具有一定虚构成分的杨氏世系。正如韦尔策的总结，家庭记忆不是基于它故事清单的完整性，而是基于对一部规范家庭史的杜撰，家庭史的合成功能总是不断重新得到实现<sup>[81]</sup>。族谱序文本呈现出典型的功利性特质，“受此功利性目的的推动，它就可以突破严格的族群来源和自然形成的世系关系的限制，实现若干实体性同姓宗族的联合”<sup>[82]</sup>。族谱序充斥着撰作者世俗的利益诉求，并且这种话语系统被塑造出来后很难再逆转。尽管如此，人们仍将这套世系话语视为权威，对建构的杨氏始祖的历史阐释深信不疑。根据罗兰·巴爾特的理论：“写作是言语所体现出来的丰富多彩的形式，由于其可贵的含混性，它既包含着权势的存在又包含着权势的显现，也就是既包含着所是者又包含着希望人们相信者。”<sup>[83]</sup>祖先对后世来说具有典范意义，个体和集体的生活实际都自然而然地以祖先为榜样<sup>[84]</sup>。这套杨氏始祖的话语体系也就成为维系杨氏宗族族人的力量源泉与精神内核，杨氏宗族历史起源的解释得到杨姓的高度认同。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泰和周边的杨姓纷纷通过世系建构，在族谱中上加入其家族，与被塑造的吉水杨氏建立强连接。可见强化宗族认同的表达凝聚在台阁族谱序中，阐述早期谱系的部分发挥了对现实的作用和影响，呈现出族谱序的世俗功利面向。当然，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层面在于，杨氏族人的利益诉求直接驱动了宗族集体记忆的强化。哈布瓦赫认为，每个群体都有其共享的集体记忆以凝聚人群<sup>[85]</sup>。杨氏始祖的构建成为了集体话语体系，与杨氏宗族文化建设相结合，充当了相当部分的集体记忆。钱杭认为，宗族在社会上立足就需要有明确的世系和能被文化传统所认同的宗族历史，这是宗族给予社会成员的用以证明其社会身份和社会权力的特殊资源<sup>[86]</sup>。“集体记忆不仅在空间与时间上是具体的，而且，我们认为，它在认同上也是具体

的……通过忆起过去，巩固了其认同。通过对自身历史的回忆、对起着巩固根基作用的回忆形象的现时化，群体确认自己的身份认同。”<sup>[87]</sup>泰和周边的杨姓家族试图保证杨氏宗族在明前期江西地域的权力关系网中安身立命。在功利性的情境中塑造出来的世系集中表达了泰和杨氏的利益诉求。

（二）故家传统与诗书嗣连：宗族建设的集体话语

台阁文人族谱序对“故家传统”的频繁叙述颇为引人注目。“世所谓故家者，非谓其他也，为有礼义之训相承于悠久，以不覆坠于厥绪，又有谱以着其世泽之所从来者也。”<sup>[88]</sup>《周氏族谱序》<sup>[89]</sup>《南溪曾氏族谱序》<sup>[90]</sup>《唐溪郭氏族谱序》<sup>[91]</sup>也强调世家望族才可能有源远流长的承续性。《西昌梁氏续谱序》<sup>[92]</sup>表达了关于“故家”的看法，批评以财富而论故家的观点，鄙夷暴发户家族，并指出善继祖先德行言语、先德学问是为“故家”。台阁文人故家论思想与明前期江西多世家大族密不可分。经初步统计，杨士奇为泰和县33个宗族、泰和外近32个宗族撰作族谱序；解缙6篇族谱序均为江西宗族而撰；梁潜22篇族谱序中有19篇为江西所作；陈循28篇族谱序中26篇为江西族人而作；王直54篇族谱序中为江西所作篇数多达39篇。族谱序呈现明显的地域格局，这与明代江西地域密切相关<sup>[93]</sup>。台阁文人族谱序还强调诗书嗣连的重要意义：“启晦自其八世祖朝奉大夫文正徙居泰和，世世读书入仕，故钟氏为泰和名族。”<sup>[94]</sup>还有《带源王氏族谱序》<sup>[95]</sup>《秦氏家谱序》<sup>[96]</sup>《西昌城西罗氏族谱序》<sup>[97]</sup>《庐陵北溪刘氏族谱序》<sup>[98]</sup>《梁氏族谱序》<sup>[99]</sup>，以上文献传达出三方面内容：

其一，台阁文臣赞扬重视读书的品质，鼓励通过科考跻身仕途。洪武三年（1370），“特设科举，务取经明行修、博古通今、名实相称者。朕将亲策于廷，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sup>[100]</sup>，科举制度在明代得以确立。为改变家族命运，家族教育的观念普遍就锁定在投身科场上。陈循曰：“吾邑之士，岁以明经应乡选者，恒数十人，而克捷者亦往往十数焉。自永乐甲午以迄于癸卯四科，凡六十人有奇，可谓盛矣！”<sup>[101]</sup>明前期江西宗族修建族谱与族人



科举成就密切关联，推动了整个地域宗族的复兴。台阁文人族谱序详述了宗族代表人物、宗族崛起途径与崛起历程<sup>[102]</sup>。科举与文化教育成为江西文人崛起和维系的力量，是保持宗族声望、维护宗族地位的重要支撑。其二，台阁文臣在族谱序中对诗书嗣连大加赞誉，书写诗书世家的学诗学文，通过重视文教保证家族文脉接续。宗族成员具有家族文化传承意识，具备了明代社会所公认的“文化隐喻”的资格。其三，台阁文人对耕读传家尤为重视，通过族谱序教育族人：“善继”方能世守家业，保证宗族兴旺，实现“科名仕宦之蝉联”，使宗族继继绳绳。台阁文人还常用根深枝茂喻故家大族子孙绵延、生生不息<sup>[103]</sup>。科场成就可以护佑家族后代，但庇佑有限，难以使家族长盛不衰、获得累世显贵。后世子孙读书不绝成为江西维系世家大族社会地位的主要源泉。

有研究者指出，明代族谱留存最多的地域有南直隶徽州府、宁国府，浙西严州府，浙东金华府、绍兴府及广东广州府<sup>[104]</sup>。族谱数量越繁盛，地域宗族越强盛。从全国范围内来看，明代江西族谱修纂活动并非最为活跃。但为何族谱数量并非引人注目的江西，反而在族谱序数量上独占鳌头？族谱序的多寡为何与族谱多寡不成正比？族谱序的繁盛若不是由宗族强盛引起的，那是由什么引起的？

要回答这些问题，就不能仅从地域宗族规模角度考虑，即不能仅将台阁文臣族谱序视为宗族内部的公共文本。江西宗族在人文传统作用下科举成功<sup>[105]</sup>，尤其是靖难之变后，政权转移，中央出现权力真空，江西族人抓住这一历史机遇，迅速崛起，参与国家政治，发挥政治才能，稳定政治局面，跻身文坛核心，永乐后文坛领导权便转移到江西派文人之手。以西城宴集为例，此为迁都次年举行的京官诗会，参加者十七人中论籍里只有江西、浙江两省，江西就占十五人，折射出明初政治势力的地缘不平衡，影响于明初文学亦十分明显<sup>[106]</sup>。以此为基础，我们的思索再进一步向前探入：哪类文人能跻身永乐后族谱序书写之列？面对请序，书写者为何不回避邀请？书写者怀有怎样的目的？与洪武、建文朝相比，永乐后族谱序有何独特功能与意义？这与明前期政治气候与文化风气有何关联？

入仕的江西族人数量增多，江西士人群体规模扩大，江西宗族政治势力随之增强。台阁文臣多为江西派文人，是国家政策的推行者、重大活动的组织者、国家思想的代言人，把持文化柄权，占据话语核心。向台阁文臣请序，是其显赫的社会地位及名望会使序言极具分量。族谱序就成为地方宗族彰显实力、提高宗族声望的平台。这样撰写权由强势地位的士人群体所掌握，毫无疑问江西派台阁文人便自然主导了族谱序的书写。

福柯认为，“如果没有话语产生、积累、流通和发挥功能的话，这些权力关系自身就不能建立起来和得到巩固”<sup>[107]</sup>。台阁文人作为族谱序撰作者，处于权力关系网络的关节点上，他们有时化身为群体利益的代表，同时又代表着个体利益。对于宗族之外而言，台阁士人族谱序被披上了浓郁的个人叙述色彩。在话语制造和流通过程中，它可以在私人话语与公共话语之间来回切换，有时将私家叙述转化为公共话语的一部分。族谱序被当时最具话语权的台阁文人所掌控，成为当时多数族谱序的撰作者。通过掌握族谱序的书写权力，表达台阁作者群体自身的话语诉求。由此可知，族谱序并非私人书写，而是具有社会功能的文学文本。

前述统计的台阁文人为江西所作族谱序具有压倒性比例，所涉宗族主要集中在吉安府的泰和、吉水、安福、永丰、庐陵、永新、万安、抚州府、南昌府、建昌府、临江府、南安府、赣州府等江西地域中。台阁士人族谱序呈现地域分布的不平衡现象，可以视为这一强势话语系统向江西倾斜的反映。在强大的宗族政治势力下，族谱序作为宗族内部的公共文献难免转换为私人话语参与到宗族建设中。族谱序书写者具有化私为公的心理诉求与便利条件，使地域性政治利益群体的表达渗透进族谱序中，呈现出江西派文人特有的权力话语和利益诉求。族谱序化身为集体的强势话语系统。江西族谱序的繁荣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江西宗族的社会地位，在地域性权力竞争中博取更丰厚的文化资本。

就台阁士人族谱序撰写对象而言，呈现出的是庞大且错综复杂的士人交际网络。向台阁士人请序的有中央高级官员、地方士人、儒医、塾师等。请序者与台阁士人的关系中，有世交、师生、同乡、





同门、同年、同僚、朋友、婚姻关系等。可见，通过乡里、教育、科举、仕宦、友谊、亲属、婚姻等多种方式交织下结成多重关系，台阁士人与请序人交往互动，将血缘、乡缘、地缘、业缘与家风、族风、仕风联结，使文化资本在族谱序文本中集聚。根据布尔迪厄的理论，呈现于客观化状态中的文化资本，主要取决于整个家庭所拥有的文化资本，那些具有强大文化资本的家庭的后代占尽便利，文化资本以一种隐秘的方式传递<sup>[108]</sup>。科大卫认为，地方社会和王朝共谋，把宗族作为建立社会秩序的基础，宗族社会对于王朝国家，对于地方社会，都是个方便的建构<sup>[109]</sup>。江西宗族势力强大，“以诗书为世业，非他族可比”<sup>[110]</sup>，这与江西籍台阁文人在士人关系网络及地方宗族网络中的权力运作密不可分。科举成功，朝廷表彰，恩赠荣衔，成为有声望的官员，宗族社会声望提高，对地方宗族产生影响，占有文化资源的优势地位。当权力话语渗透进台阁文人族谱序中，族谱序服务于权力关系的建立和巩固。由于地方是家族的延伸，因此族谱序的书写不但使宗族的政治地位有所提升，还体现出国家在形塑明代前期基层社会运作、地域文化权力建构层面发挥了影响力，强化了原有地方宗族的权力关系格局。由此可见，台阁文人族谱序撰写的背后，反映的是台阁文人推动江西宗族在地方社会权力利益格局中走向强势地位上发挥的重要作用。台阁士人撰作的族谱序也因此话语争夺中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与政治意义，实现了永乐后族谱序话语功能与文体价值的转型。

## 余论

以上对明永乐至成化台阁文人族谱序的考察，主要围绕族谱序体量新变与体制新变、功能转型间的逻辑关系展开。必须要说明的是，即便是程敏政以史法为谱法式的族谱序，为实现话语功能，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功利倾向与扳援名贤的书写痕迹。这说明台阁成员以国家思想代言人的身份参与地方治理与宗族建设，族谱序成为其在地域社会中争夺话语主导权的工具，成为维系宗族向心力与认同感的表征，是宗族亲属、地方士人、国家精英的互动之

区，是家庭宗族、地域社会整合到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之场，是文化权力与政治利益的博弈之地。添枝加叶的书写方式、人为建构的文学叙述，充分体现永乐后国家政治的强势性、社会文化权力网络的多元性与宗族活动的复杂性。因此应放置在永乐后政治语境与宗族文化背景中解读，不必拘泥于世系可信度与功利性“加工”而对此类书写策略一味贬低。事实上，对于台阁儒臣这种政治化身份带来的思想意识，对于族谱序这种社会属性与应用属性极强的文体而言，这是难以避免的文学现象。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永乐后不只通过编修族谱，还通过地方社会建物等更具张扬的新形式使宗族历史客体化。台阁文臣除族谱序撰作外，还存在更宽泛意义上的宗族建设与地方史构建的新的话语文本，如墓祠记、村祠记、庵祠记、家族世系碑文等，这使台阁儒臣在宗族与地方事业的文学实践上获得了更具弹性的表达空间，丰富和拓展了永乐以降宗族建设的新内涵与新功能。对上述文体属性与文体范式的阐发，对与同属“史部序”类中地方志序关系的探究<sup>[111]</sup>，因篇幅所限，似不容再论，若进一步观察，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多维视角下明永乐至成化台阁文人的文体体系，并对台阁体价值做出更为全面客观的学术判断。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基金项目“明代前期台阁文人的寿序书写”(20YBB2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 多贺秋五郎：『中国宗谱の研究』（上卷），第1页，日本學術振興會1981年版。

[2] 明清以降谱书的名称繁多，除不少人沿用家谱、族谱、宗谱、世谱、家乘等外，又有用支谱、族系、族讲、世家、本支图、祖谱、联宗谱、合谱的。参见陈捷先《族谱学论集》，第8页，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版。

[3] 《家族谱研究》等文参见常建华《社会生活的历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族谱学的国内研究主要以仓修良、郑振满、冯尔康、王鹤鸣、钱杭、常建华、赵世瑜、刘志伟、张爱华等学者为代表。海外研究以濑川昌久、多贺秋五郎、井上徹、科大卫等学者为代表。

[4] 谱例、族谱序、世系图、谱传、族规家训属族谱主体，此外还有世系录、墓图、村居图等。



[5] 陈捷先:《族谱学论集》,第10页。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谱后序”为刊于族谱卷末的序文,属“跋文”概念之列,不属本文族谱序文类的研究范畴。

[6]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有学者探讨族谱序的史料研究价值,详参邢永川《试论谱牒序跋的文献价值——兼谈中国谱学的若干问题》,《谱牒学研究》(第三辑),中国谱牒研究会编,第284—288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7] 黄卓越:《明永乐至嘉靖初诗文观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宗韵:《明代家族上行流动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常建华:《明代宗族组织化研究》,故宫出版社2012年版;吴宣德、宗韵辑:《明人谱牒序跋辑略》,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许齐雄:《理学、家族、地方社会与海外回响》,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此外,还有于程琳多篇探讨明徽州谱序的论文,都对明代族谱序进行了详尽的研讨。

[8] 中国古代序文有书序之序、有赠序之序,参见《中国古代文体学论著集目(1900—2014)》,李南晖主编,第181页—第30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9] 近年明代台阁体研究详参李晗《明代台阁体研究十年(2010—2020):回顾与展望》,《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10][18][23][31][32][50][73][74][78] 杨士奇:《东里续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8册,第538页,第539页,第509页,第525页,第527页,第534页,第524页,第516页,第515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11][37][66][70][89] 金幼孜:《金文靖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0册,第718页,第733页,第733页,第730页,第730页。

[12] 曹树基指出以规模计首推洪武大移民,参见葛剑雄、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五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对明代移民的论述,详参张国雄《中国历史上移民的主要流向和分期》,《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

[13] 参见《茨溪刘氏祠堂记》《浮梁李氏祠堂记》《姚氏祠堂记》,杨士奇:《东里续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8册,第371页、第379页、第422页;《龚氏祠堂记》,王直:《抑庵文后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1册,第315页。

[14] 尹俊搜检出元人序跋253篇,参见尹俊、席永春《元人文集家谱序中的元代家族》,《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

2005年第3期;常建华考订出现存元代文集族谱序跋总计233篇,参见常建华《元人文集族谱序跋数量及反映的谱名与地区分布》,《史学集刊》2008年第6期;黄超等统计出宋代族谱序跋104篇,参见黄超、王善军《宋代族谱序跋所涉家族的地域分布》,《大连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梅华统计出宋代族谱序跋103篇,参见梅华《宋代家谱序跋的文化意蕴》,《社会科学家》2012年第8期。

[15][22][63] 宋濂:《宋濂全集》,黄灵庚编辑校点,第607页、第632页、第651页,第671页,第43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

[16][17][61][62] 方孝孺:《逊志斋集》,徐光大校点,第414页、第418页、第422页,第418页,第414页,第416页,宁波出版社1996年版。

[19][28][68] 商辂:《商辂集》,第119页,第100页,第162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20][42][43][55][56][57] 程敏政:《篁墩文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2册,第556页,第420页,第606页,第398页,第406页,第601页。

[21][35][44][45],李东阳:《李东阳集》,周寅宾校点,第462页,第411页,第953页,第967页,岳麓书社2008年版。

[24][25][33][38][52][64][88][94][95][96] 胡广:《胡文穆公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二九》,第23页,第26页,第37页,第40页,第50页,第23页,第23页,第30页,第32页,第57页,齐鲁书社1997年版。

[26][27][34][40][41][54][90][97][101][110] 陈循:《芳洲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三一》,第177页,第173页,第177页,第182页,第173页,第183页,第177页,第133页,第183页。

[29][30][48][49][75][92] 杨士奇:《东里文集》,刘伯涵、朱海点校,第72页,第94页,第72页,第80页,第68页,第72页,中华书局1998年版。

[36][51][67][69][76][98] 梁潜:《泊庵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7册,第299页,第253页,第282页,第265页,第305页,第279页。

[39][71] 杨荣:《文敏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0册,第227页。

[46][100] 张廷玉等:《明史》,第125页,第1695页,中华书局1974年版。

[47] 余继登:《典故纪闻》,第142页,中华书局1981



年版。

[53][91][99] 萧铤:《尚约文钞》,《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三三》,第43页,第48页,第42页。

[58] 常建华:《明代宗族组织化研究》,第283页,故宫出版社2012年版。

[59] 常建华:《程敏政〈新安程氏统宗世谱〉谱学问题初探》,《河北学刊》2005年第6期;黄国信:《新安程氏统宗谱重构祖先谱系现象考》,《史学月刊》2006年第7期。

[60] 左东岭评价方孝孺文风“志正气盛”、代表“活力灵感”,参见左东岭《元明之际的“气”论与方孝孺的文学思想》,《文艺研究》2006年第1期。

[65] 张载:《张子全书》,第92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72][86] 钱杭、谢维扬:《传统与转型:江西泰和农村宗族形态》,第95页,第94页,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77] 解缙:《文毅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6册,第714页。

[79] 刘志伟:《族谱与文化认同——广东族谱中的口述传统》,《中华谱牒研究》,王鹤鸣等编,第41页,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80][81] 哈拉尔德·韦尔策:《在谈话中共同制作过去》,《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哈拉尔德·韦尔策编,李斌译,第109页,第10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82] 钱杭:《关于同姓联宗组织的地缘性质》,《史林》1998年第3期。

[83] 罗兰·巴尔特:《写作的零度》,第2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84] 扬·阿斯曼:《关于文化记忆理论》,《文化记忆与历史主义》,陈新、彭刚主编,第7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85] 莫里斯·哈布瓦赫著:《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第4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他首次提出文化记忆的概念,此后“文化记忆”因其内涵的复杂性引发学界讨论,参见《文化记忆研究指南》,阿斯特莉特·埃尔、安斯加尔·纽宁主编,李恭忠、李霞译,第2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87] 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译,第32页,第4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扬·阿斯曼指出文化记忆“都是在反复进行的社会实践中一代代地获得的知识”。详参《集体记忆与文化身份》,陶东风译,《文化研究》第11辑,陶东风

主编,第4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93] 从地域角度对台阁体及其与地域文学关系及影响研究,国内学者作出了有益尝试,如廖可斌、魏崇新、陈广宏、左东岭、张红花、王英达等,不再细举。海外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有 John W. Dardess, *A Ming Society: T'ai-ho County, Kiangsi, in the Fourteenth to Seventeenth Centur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另可参见徐雁平、罗时进在地域与文学关系的理论层面对明清文学的专门研讨。

[102] 参见宗韵《明代家族上行流动研究》,第232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03] 族谱序中相关论述颇多,见杨士奇《丰城槎溪王氏谱序》(《东里续集》,第529页)、陈循《泰和洲下罗氏族谱序》(《芳洲文集》,第184页)等。

[104] 章毅:《明代家谱的著录及其社会史意义》,《九州学林》,第4卷第4期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编,第225页,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6年版。

[105] 参见廖可斌《地域文人集团的兴替与元末明初文学思潮的变迁》,《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4期。另可参见吴宣德《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明代科举制度研究,以龚笃清、郭培贵、吴宣德、王凯旋等学者为代表;明代科举与文学关系研究近年成为学界热点,详参郭万金、邱进春、陈文新等学者专书,不再赘列。

[106] 何宗美:《文人结社与明代文学的演进》,第82页,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107] 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译,第19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108] 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包亚明译,第19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09] 科大卫:《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卜永坚译,第11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11] 族谱与地方志的关系研究,参见戴思哲《谈明万历〈新昌县志〉编纂者的私人目的》,《中华族谱研究》,王鹤鸣等编,第156—162页;刘永华《道光〈平和县志〉介评》,《第二届地方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编,第257—第264页,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戴思哲《中华帝国方志的书写、出版与阅读:1100—1700年》,向静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

责任编辑:赵培